



上海的冬日里，翻开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出的九卷本《赵园文集》，仿佛重走了赵园先生近半个世纪来，在士人心性、世风人伦研究领域的深耕之路。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到九十年代的明清士大夫研究，再到新千年后的当代史研究，赵园先生的学术突围，恰是中国学术持续转型的缩影。那些著作如记忆的刻尺，既镌刻着一代学人的蜕变与沉淀，也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学风流变。

■ 杜英

截然不同的学者气质

《赵园文集》较之初版本，有的篇目做了调整，有的增加了前言附录。比如，《论小说十家》的前言，就是作者2011年重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现场原点的感悟，有反思也有固守。在篇目的增删、用词的更新中，清晰可见三十年来现代文学学科规训的走向。

赵园先生在当代学人中实属异数。那一代的学人对理想主义的迷恋，也有道德苦行的自赎。这种混合的气质，造就了先生为人、为学的正气与硬气。在新世代学风中，这种坚硬的气质相当稀有。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新时期的昂扬跃动，还是世纪末的苍劲寥廓，抑或新千年的五味杂陈——纸短情长的，永远是她以别样文字写历史之重的赤子之心。就连那一缕诗意，也自带硬度。她以历史的意识，穿透士人的生命体验，剖析维系世道人心的言说制度。以史为镜，也是在研究中反思自我、体味现实。她将历史关怀、文学敏感和知识分子的严苛进行了近乎完美的平衡。

由文学看历史，文人与政治及道德的关系，是先生持续关注的话题。将人心置于危急时刻中予以考量，道德与政治可能依然是把握人性动荡的显著凭依。

她的著作《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开篇就谈及明代政治文化中“相争相激”的“戾气”。明代的政治暴虐培养了明遗民的坚忍，也鼓励了以苦行为道德的时代风气。此外，《艰难的选择》也谈到政治对于家庭制度与日用伦常的渗透。从现当代文学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先生始终关切的是非常时刻文人如何介入现实政治、形塑道德。

因为有了现实政治与日用伦常的关怀，先生对于现代文学的批评眼光偏向于五四精神与左翼传统。《艰难的选择》讨论现代作家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读来有悲壮意味。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被视为

坚守与通达 学人的精神长卷



赵园

1945年生，河南尉氏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以及散文集《独语》《红之羽》等。

乡土缅怀中的现代声音

先生久居京城，身上却散着乡土中国的沉郁气质。跟随先生学习时，每逢周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老师都要返所上班。我常常从望京的学生宿舍去建国门的文学所见先生。多年后，我只记得挤上那趟去建国门的公交车，总得拼尽全力；陪着先生走过的那个地下通道，总是寒意凛然。先生常常会坐坐在那里的行乞者一些零钱，有时还会把家里的衣物带给他们。她说：“他们很多都是河南农村的老乡！”虽然先生本人并非来自乡村，但乡村那片土地是她时时挂念的。

先生身上广阔的中原气质，学术上体现在她对于北京城市文学的特别发现。《北京：城与人》即可视为城中人的一次“乡土中国”的精神漂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热潮、上海文化怀旧潮兴起。在文学与历史研究中，上海通常被作为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标本。而先生的创见在于更早、更另类地发现了北京——一个“更像乡土”的“精神故乡”的文化存在。综观全书，文学北京或可视为关于“现代中国”的一种特别

再现形式。它指向与“现代”相对立的一种“过去”的时间意识，是与“现代性”概念的若干含义（五四启蒙、科学民主、新文化理想等）相对照的一种“传统”价值的眷恋。它既包括知识分子的乡土记忆，也涵盖现代化所唤起的城中人的精神返乡与传统固守。

先生抓住了“乡土感”与“京味”，来描述文学北京。“乡土感”，指郁达夫、师陀等非京籍的现代作家对于北京的情感接纳与精神认同。这种接纳既来自知识分子性情与北京文化品格的相洽相谐，也源于乡土社会文化所遗留下来的乡愁基因。“京味”，则指向语言文字趣味、文学风格现象。“京味”的诸多形态，包括理性态度、自足心态、笔墨情趣、平民趣味、幽默调侃等；也包括生活的艺术、方言的艺术、平民的精神等。如果说上海的摩登开拓动人心魄，那么北京的田园气质则令人慰藉。《北京：城与人》的贡献在于展示了中国城市文化品格的多元性，在对乡土的缅怀中响起了现代的声音。

文字从心头笔尖流出

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论著也有自觉的文体追求。《论小说十家》

就写得不平凡。我非常喜爱那篇《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她也中意那篇，觉得写得较为尽兴。先生用“情味”来描述萧红灵气灌注、浑然一体的“稚拙”，一种从语言组织到小说结构的感性情调，并由此提炼出一个具有美学意义的“童心世界”。那是一种感受世界的整体方式、体贴物情的审美态度，以及文字表达的朴素感性。先生的文字表现力，不仅仅有赖于审美感受的穿透力与语言组织的别致感。叩问历史深处的黑暗滞重，在充满欢欣的生命意识与无尽广漠的民族忧患之间，先生与萧红抵达共情。这寥廓的荒凉感负载的，是五四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启蒙理想。先生那一代学人，改造社会的启蒙理想仍然是融入呼吸、化入血液的存在。他们回望或古老或现代的中国，在各自心仪的文人志士那里，完成了一次次思想的滋养、精神的激发，以及情感的共振。

先生的文体追求，也是敬畏文字、体贴读者的本性使然。哪怕是一则便笺，她都要琢磨用词。先生所喜爱的文字是别致而不令人费解，富于变化而又不陷入风格化的。因为，同一的语调节奏、单调的常规写法，都会造成读者的阅读疲劳。或许读我的论文，曾让她感到兴味索然，她屡屡提醒我应训练写随笔，要有学术与创作两套笔墨。祖师爷王瑶先生也曾如此教导过我，我后来有机会到海外访学，她还不忘记嘱咐我，空闲时写点美国印象之类的游记，练练笔头。在她看来，散文尤其考验作者遣词造句的能力；即使是论文，也不妨杂用随笔写法，以求舒展畅达；还可适当增加阅读的趣味，若处理得当，亦会使论述更有丰富性。先生读书时，遇到精彩的著述，也会写信告诉我。有一次，她正在读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因与我关心的问题相关，她特意写信给我，建议读一下绪论。“这本书写得很好，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与社会生活史的分析结合，文字（中译本）也好。”

先生喜欢有力道的文章。所谓力道，并非表述直露或有情绪化的倾向，也非由理论到理论的术语操练。先生并非排斥理论，反倒认为好的文章恰恰因为理论训练好，诠释集中，故而论述不一般，有所创获。当代学人中，首推洪子诚、蔡翔等。她自己，从现代文学走来，再到明代遗民，再折回当代史，行文已经举重若轻、克制而内敛。转向明清之际后，先生的写作方式与行文都有改变：征引精审节制，论断尤为慎重；材料有力处，让材料说话。不过，无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灌浆饱满的生命力迸发，还是

新世纪以来风骨峻拔的痛思，她的文字都是从心头笔尖自然地流出。

她就是那份美好

先生和“知识分子”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从研究知识分子思想史、明清之际士大夫，再到践行学人立场，关心青年学子。一辈子那么短，但也可以那么长。先生的著作不强调“立场”，却难以全然脱出“立场”。那是体贴人间冷暖的现实立场，也是自省自律的学人立场。先生的诗心仿佛一缕光，其震撼性犹如曝光，让历史的底片显现而出。历史获得了形式的尊严，而形式又获得了历史的坚实。先生将历史的幽暗、民族的多舛以及士林的世相呈现出来，交予批判之光、理想之光。那些构成我们现实却又空泛无实的“彼亦一非非，此亦一非非”的言说，便纷纷坍塌下来。在废墟中升起的，是明遗民“光明俊伟”的人格，也是先生坚硬如水的风骨。

先生就是那样，让你感到既沉重又亲近，既严厉又体贴。我刚到上海工作那段时间，和她频频鸿雁飞书。津津乐道的，不外乎家长里短与学术文章。作为“青椒”（高校青年教师形象化称呼）的我，工作和生活像上台演戏，赶完这场又赶下场。电邮中，她一边开解我，不必搞得那么紧张，“日子长着呢，悠着点”；一边又提醒我，出版发表下功夫，“每一篇、每一本都尽全力”；一面嘱咐我，劳逸结合，该玩还是要玩玩；一面又督促我，“要有长远的计划，不要临时想题目”——简直就像一个老母亲对待蹒跚学步的孩子，不放心又不能不放手。我想，她可能对我的期待一降再降；可禁不住又要敲敲点点，怕我松懈倦怠。就这样，先生仍然逐字逐句，批阅我的论文，直到她的眼睛看电脑已经费力。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带着学生来，一面有样学样，一面也会体会到她的甘苦。

学术之途，道阻且长。路上的种种烦恼，一直都只向她倾诉。每每惭愧自己才疏学浅，不能如其所望。先生曾感言“被光明俊伟的人物吸引，是美好的事”，对于我而言，她就是那份美好。（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赵园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东瀛之行

1924年冬，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此时，吴石的好友何遂出任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邀请赋闲在家的吴石出山，任该师军械处处长并统领炮兵，兼任南苑干部学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奉两军的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任吴石为作战科长。1927年，方声涛（方声洞烈士胞弟）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又回福建任军事所参谋处处长，致力整顿本省军。1928年冬，已是福建省军事厅一员、事业渐入佳境的吴石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到日本学习军事。这种人生轨迹的转变，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吴石的想法得到省府代主席方声涛——这位曾留学日本的长者的理解和支持。吴石找到方声涛，向他表述自己的想法。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方声涛鼓励吴石走出国门，继续军事学习，争取更大的建树，并答应他留学经费由他想办法解决。方声涛的一番话让吴石那颗悬浮的心静了下来。在方声涛的大力支持下，吴石最终取得公费保送资格。

吴石在自传中对留学缘由有简要的叙述：“余自出校任事以来，备受刺激，感想良多。时属第一次欧战之后军事学术日新月异，诚有再求深造之必需，每与曩曾留日之同学返，获知日本大陆组织健全，颇负时誉，乃谋东渡求学。”

另一方面的原因，吴石在自传中并没有明白说出。那就是：保定军校毕业后，累遭不顺。尽管怀着改善军民生活的愿望，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但由于当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立 著

时政治的混沌，深感力不从心，隐退出国、摒弃参事的想法自然也一度占据他的脑海。想法归想法，实现起来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吴石后来回忆：“日本陆大极不易入，虽收中国学生为第一种政策耳，初系每年招收一次，后易为三年一班。余抵日后，方知最近一班入校仅一年，须待其毕业，始得收新生，当时，颇感彷徨。一般友好劝余不如先入炮兵专门学校，余纳其言，爱补习三月，为投考炮校之准备。初日本各兵科学校皆可保送，毋庸考试，厥后来者渐多，乃废保送之例，而且考试极严，余幸应试及格，幸获考取。”

经过近一年的折腾，1930年秋，吴石从日本野战炮兵炮校毕业，埋头准备报考日本陆军大学，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此时投考日本陆大难重重，第一因为来考者多，合各省籍计共四五百人，余为福建省政府所保送，限于经费，无法继续，势须先解决学费困难问题，余遂返闽交涉并至南京请愿。当时，日本陆大限定我国学生名额，每期仅六名，来考者四五百人。中间有知难而退者，但仍有十人候考。余志在必得，虽知困难，意不稍减，乃竭其全力准备，延富

有应考陆大经验者二人作为导师。准备三个月后，始往应试，与试者四十人，而录取名额仅六名，群感希望甚微，乃于录取后向日政府交涉增加名额。时弊原当政，对吾国比较缓和，允增两名，共为八名，余幸录取入校。”

这段回忆表明，吴石能够进入日本陆大确是极不容易，颇费周折的。同时留学费用问题也传来好消息。《福建民国日报》1930年12月6日的版面上出现过《吴石等学费十一月仍发三百元》一则新闻。

吴石当时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之刻苦、目标之明确、心得之特别、成绩之突出，成为“最有心得之人”在情理之中。

因在校成绩优异，在同一拨同学中有人给他安上“十二能人”（即娴中外古今兵学、通文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的头衔。对于这样的头衔，吴石一照单笑纳，颇感自豪。

耀着“中国”两个字。

1930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在东京举行。当我国体育代表团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率领下到达东京时，吴石振奋万分，当即参加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于神田区神保町中华青年会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并参加啦啦队，自比赛开始之日起连续出场，为我国运动健儿呐喊助威。

在吴石留学期间，相继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

早在1931年，吴石的目光就投向了东三省，担心战事的发展，“余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人之野心已昭然若揭，大战爆发仅属时间问题耳”。

1932年侵华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我国驻军奋起抗战时，日方报社在东京大发“紧急号外”，卖报者则在街上大肆喧嚣，侮辱我国的什么“严惩支那”之声震耳欲聋，刺人肺腑，尤使吴石痛心疾首，义愤填膺。日方恶劣的行径激起了他极大的爱国热忱。

他在遥远的日本思念着祖国。他感慨于多难的祖国，饱含着思念和悲愤，写下一篇篇回味无穷的动人的爱国诗篇。

在《时事》中表明自己相信祖国不会沦亡的心境：“惊闻辽朔播风，遗恨无端耻辱新。政事方深棋劫局，斯民几有瓦全身？虜龙边塞谁轻卖，燕赵豪雄已失真。安得神州坚志众，古来三户足亡秦。”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